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軍事政變的成因、結果與影響：泰國個案研究

The Causes, Outcomes, and Effects of Military Coups: The case of Thailand

doi:10.30390/ISC.200001_39(1).0003

問題與研究, 39(1), 2000

Issues & Studies, 39(1), 2000

作者/Author：陳佩修(Pei-Hsiu Chen)

頁數/Page：35-6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0/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001_39\(1\).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001_39(1).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軍事政變的成因、結果與影響： 泰國個案研究*

陳佩修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助理教授)

摘要

不論在政治發展或民主化研究中，軍事政變都是一個重要的議題。過去研究者大都著重在政變成因的分析，忽略政變結果及其影響的探討；這對政變研究而言是一大瑕疵。因為不論政變是成功或失敗，均會對政治過程產生影響；而政變在社會與經濟層面所產生的效應，將會對爾後的政變造成反饋。

泰國就是符合上述論點的一個例子。自一九三二年開展憲政迄今，泰國共舉行過 19 次全國大選，也經歷了 19 次軍事政變。雖然政治過程深陷「惡性循環」的泥淖，但卻在民主化潮流中創造出泰國的「半民主」成果。泰國政治中軍事政變的意義與內涵，顯然有別於一般的概念。

本文嘗試建構泰國政變原因的分析模型，再由政變發生的「頻率」區劃出泰國政變在時間序列上的「間歇性」與「階段性」，並自「群眾運動」與「泰王角色」兩面向探討影響泰國政變成敗的因素，以及政變的效應與反饋。

關鍵詞：軍事政變、泰國政治、泰王、半民主

* * *

*In Thailand, an unsuccessful coup d'etat is like a reelection, a successful one
is like a general election.*

— Sulak Sivaraksa^①

* 本文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主辦之「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1999」（台北南港，88年4月16~17日）。作者感謝宋鎮照教授對本文之指正，以及顧長永教授、龔宜君博士之評論意見。

註① Sulak Sivaraksa (蕭素樂) 是泰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先驅與非政府組織運動的領袖，因反對軍人干政而流亡海外多年。1984年被控觸犯對泰王大不敬罪 (lese-majeste) 入獄，1992年因批判泰王對1991年政變的支持是引發1992年「黑色五月」流血事件的主因，再度遭大不敬罪起訴，然該案纏訟經年後於1995年判決無罪，開創泰國司法史上破天荒的判例。Sulak曾獲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並為1995年瑞典典 The Right Livelihood Award 得主。所引出自：Sulak Sivaraksa, *Loyalty Demands Dissent: Autobiography of an Engaged Buddhist* (Bangkok: Thai Inter-Religious Commission for Development Press, 1998), p. 192.



壹、前言

關於發展中國家政治的研究，政治發展論者經常將焦點放在政治穩定與變遷的問題上，也經常以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政治制度化（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概念做為分析架構。^②依據杭廷頓的觀點，制度化程度與政治穩定性二者之間呈現正相關；制度化程度愈高則政治趨於穩定，反之則趨於不穩定。而在政治過程中，對政治制度化最重大的影響因素就是軍事政變，因為它對政治體系之衝擊與所造成之改變，是最鉅大與顯著的。^③

此外，在民主化研究的軍文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議題方面，政變研究亦有其重要性。同樣借用杭廷頓的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概念，由威權體制轉型而成的新興民主政體具有一個共同的隱憂，就是這些國家的軍文關係缺乏工業化民主國家所擁有「客觀的文人控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④的共同特性；而這一隱憂是民主轉型成果能否確保與維持的關鍵因素。而政變是軍人介入政治的極端形態，也是軍文關係的根本破壞。

因此，過去有關政變的研究大都著重在政變發生原因的分析與預防之道的探討，將政變視為一種對國家機關的否決力量（veto power）。據此，政變成功意謂著舊政治體制運作的嘎然而止，以及政變者領導新階段的開展；反之，政變的失敗導致國家機關加緊政治控制，政變者將遭處決、長期監禁或流亡海外，政變的效應則煙消雲散。這種對政變賦予類似「零和」（zero-sum）、「成王敗寇」的價值判斷，使政變研究潛藏著重大瑕疵。事實上，不論是成功的政變或失敗的政變，均對政治過程產生影響；這必須先探究影響政變成敗的決定性因素，再分析政變成敗對政治體系所造成的衝擊。此外，政變所產生的社會與經濟層面的效應（effect），將會對爾後的政變造成反饋（feedback）；這種反饋效果不必然不利於下一次政變的發生，而政變也不必然予人一種負面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因此，對政變抱持一種不預設價值判斷的態度是必要的，而除了政變成因的分析外，政變的結果及其影響也有必要

註② 政治制度化的意涵除了涉及政府體制、政黨體系等政治制度為人們所接受的意義外，也涉及政治過程中為人們所接受的價值，例如：一人一票的祕密投票制、未經立法機關同意不得課稅、軍人服從文人指揮等。請參閱：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Vol. 17, No. 3, (Sep. 1965), pp. 386~430.

註③ 陳鴻瑜，「泰國的軍人與政治變遷」，*東亞季刊*，第24卷第3期（民國82年1月），頁2。

註④ 杭廷頓所謂的「客觀的文人控制」包含以下特性：第一、高度的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professionalism）與軍人對本身專業能力與權限分際的自我認知；第二、軍人確實服從及尊重文人政府對外交與軍事的基本決策；第三、軍人認知並接受文人政府對其某些專業能力與自治權力範圍事項的指導；第四、據此將軍人介入政治事務與政治力干涉軍事專業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請參閱：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83~85.



獲得同等重視。

泰國就是符合上述論點的一個特殊實例。泰國自一九三二年廢除絕對君主政體，開啓憲政時代迄今，共舉行過 19 次全國大選，也經歷了 19 次軍事政變。雖然政治過程深陷「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 的泥淖，但在民主化潮流中卻不缺席，並創造出泰國人稱爲「半民主」(semi-democracy) 的成果。^⑤此外，根據筆者的觀察，在泰國的個案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政變失敗者經常在短暫的監禁後就獲得赦免出獄，並被允許重返政變前的職位。這些政變領袖的政治企圖心並不因此趨於平淡，反而經常「轉換跑道」從政，不論是參選國會議員或被不同政府拔擢入閣擔任部長，轉型成功的例子甚多。泰國政治的確十分奇特，政變失敗者非但不因此身繫囹圄或身敗名裂，反而屢屢經由選舉出任民意代表或聯合內閣閣員，另創政治生涯的高峰，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可謂絕無僅有。

貳、政變研究：文獻的回顧

軍事政變 (coup d'état)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發展中國家政權更迭與政治繼承的最主要方式。政變與革命 (revolution)^⑥不同，革命是一種根本的、快速的、激烈的、無可逆轉的社會變遷。政變也和叛變 (mutiny)^⑦有異，叛變是一種對合法軍事權威的集體反抗。

關於政變的定義，大部分著重在軍事組織的介入。索勞 (Marricio Solaun) 與昆恩 (Michael Quinn) 界定政變爲「非法推翻或取代國家最高行政當局的行動，主要是軍隊所發動。」^⑧路瓦克 (Edward Luttwak) 研究指出：「政變是國家機關 (state apparatus) 內一個重要部分所進行的滲透，目的在取代政府以控制國家機關其餘的部

註⑤ 「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半民主」(semi-democracy) 是泰國學者經常用來指稱泰國政治過程與民主轉型的名詞。參閱：Likhit Dhiravegin, *Semi-Democracy: The Evolution of the Thai Political System*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註⑥ 英語中的「革命」(revolution)一字是由十五世紀的義大利文“rivoluzioni”一字轉譯而來，意指天體運行達到一個非常接近的狀態，也就是天象即將遽變的時刻。當時是一個占星術 (astrology) 盛行的時代，因此政治情勢的驟然轉變，就被稱爲“rivoluzioni”。1622年英國克雷倫敦助爵 (Lord Clarendon) 以英文的“revolution”指稱英王查理二世推翻共和政體 (Commonwealth)，復辟斯圖亞特王朝 (House of Stuart Restored) 的政治遽變。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後，「革命」才成爲一個普遍化的名詞。請參閱：Peter Calvert,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3.

註⑦ Elihu Rose, “The Anatomy of Mutiny,”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8, No. 4 (Summer 1982), p. 561.

註⑧ Mauricio Solaun and Michael Quinn, *Sinners and Heretics: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at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p. 1.



分。」^⑨路瓦克的定義雖未明示軍隊就是渠所謂國家機關內的重要部分，但證諸第三世界國家軍人干政的普遍化，軍隊已成為暴力的合法管理者，政變就是對軍人與文人關係的根本破壞，由軍人完全取代政府。因此，有學者乾脆將政變直接定義為「軍隊內部的部分成員或小集團企圖直接掌控政治權力的行動。」^⑩

歐肯（Rosemary H.T. O’Kane）為避免狹隘的定義模糊了政變成因的分析，提出「政變是國家機器（machinery of the state）內部某一團體的快速行動，以非法手段變更政府。」^⑪此一定義隱含只有軍方、警察、官僚體系或其他國家機關內部的團體才能發動政變，排除其他勢力發動政變的可能。

范納（Samuel E. Finer）自拉丁美洲的實證研究中給予政變一個操作型定義：政變是軍人干政的極端方式，對原合法政府的干涉，由『影響』到『勒索』再到『取代』，以達到最終取代合法政權的目的。行動的程序包括：^⑫

- 一、支持者的招募與任務分配（trabajos）；
- 二、參與行動各方的交易與承諾（compromisos）；
- 三、單一部隊或軍營的發起行動（accion）；
- 四、發布政變聲明（pronunciamiento）；
- 五、佔領首都內的重要政府建築與通訊中心；
- 六、宣告政權轉移；
- 七、任命軍事執政團以確保統治，聲明政權移轉是過渡性質，並承諾回歸合法統治。

學界關於政變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一九七〇年代是政變研究的高峰期。究竟是什麼原因吸引學者以政變為研究主題？根據齊瑪曼（Ekkart Zimmermann）的說法，學界對政變研究的興趣主要來自兩方面：「第一、政變發生的頻率極高，在若干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過程中，政變的次數甚至多過選舉；第二、與其他宏觀政治分析（macro-political analysis）領域的主題，例如革命、抗議或動亂相較，政變相對具有同質性

註⑨ Edward Luttwak, *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7.

註⑩ Habibul H. Khondker, "Bangladesh: Anatomy of an Unsuccessful Military Coup,"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13, No. 1, (Fall 1986), p. 127.

註⑪ Rosemary H. T. O’Kane, *The Likelihood of Coups* (Aldershot, U.K.: Avebury, 1987), p. 22.

註⑫ 范納 (Samuel E. Finer) 認為，由於歐洲國家較缺乏政變的實際經驗；因此，軍事政變 (coup d’etat) 一詞是一般用語，沒有嚴謹的定義，而與「武力政變」(coup de force)、「軍事叛亂」(military revolt)、「叛變」(mutiny)、「反叛」(rebellion)、「暴動」(putsch) 等交互使用。拉丁美洲國家因政變頻仍，在用語上就有明確的區分。拉丁美洲國家使用「革命」(golpe de estado) 一詞，而歐洲人所理解的政變 (coup d’etat) 則是渠等所謂「軍營叛變」(cuartelazo)。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2n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1988), pp. 140~142.



(homogeneous phenomena)，適合進行跨國性多變量分析 (cross-national multivariate analysis) 研究。」^⑬

首先，就政變發生的頻繁程度而言，湯普森 (William R. Thompson) 的研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自一九四六至一九七〇年的二十五年期間，在 59 個國家中共發生 274 次政變。」^⑭簡諾維茲 (Morris Janowitz) 的研究列舉一九四七至一九七五年期間 52 個國家 (不列入歐洲國家) 的 128 次政變。^⑮范納的研究則統計自一九四七至一九七五年期間，51 個國家 (列入歐洲國家) 的 130 次政變。^⑯甘迺迪 (Gavin Kennedy) 的研究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二年間，第三世界國家共發生 284 次政變。^⑰歐肯的研究則統計一九五〇至一九八五年間，67 個國家的 144 次政變。上述政變研究在政變的定義、政變的選擇 (失敗的政變是否列入計算) 以及時間的長短都不相同；但統計成果所凸顯「政變發生的高頻率」卻是明顯的共同點。(表一)

其次，政變彼此間具有較高的同質性。政變的發生雖然可能與軍隊無關，但大部分政變都由軍人所發動。^⑱此外，政變過程可能使用武力，但大多數政變是不流血的。^⑲齊瑪曼認為，政變在形式上是一種菁英抗議行為 (elite protest behavior)，與革命之間的區別十分明顯；但就動態的觀點，不同類型的抗爭可能彼此產生關聯性。以政變開始的抗爭可能最終以推翻社會秩序的革命結束。^⑳

學界對於政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變為何發生的問題上。這種政變成因的研究，主要在分析政變策動者 (plotter) 的動機與時機因素。諾德林格 (Eric A. Nordlinger) 的研究指出：「軍事政變最普遍的動機是為捍衛或提升軍方的集團利益 (corporate interests)。至於發動政變的時機，則經常是文人政府政策失當，因而執政的合法性 (leg-

註⑬ Ekkart Zimmermann, "Toward a Causal Model of Military Coups d'Etat,"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5, No. 3, (Spring 1979), pp. 387~391.

註⑭ 湯普森的研究對政變的定義是：「常規武裝部隊以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的方式，推翻或試圖推翻國家的最高行政當局。」William R. Thompson, *The Grievances of Military Coup-Makers* (Beverly Hill, Ca.: Sage Publications, 1973), p. 52.

註⑮ Morris Janowitz,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51~56.

註⑯ 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pp. 269~273.

註⑰ Gavin Kennedy, *The Military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Duckworth Press, 1974), pp. 337~344.

註⑱ 根據麥金萊 (R. D. McKinlay) 與柯漢 (A. S. Cohan) 的研究，1951 至 1970 年期間各國所發生的政變中有 80% 是由軍人所發動。請參閱：R. D. McKinlay and A. S. Cohan, "Military Coups, Military Regimes, and Social Change," paper delivered at 197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p. 2.

註⑲ 根據湯普森 (William R. Thompson) 的研究，1946 至 1970 年間所發生的成功政變中，71% 的政變僅遭遇小規模的抵抗，甚至是從未遭到抵抗；而 67% 的個案是不流血政變，即未有人員傷亡。請參閱：William R. Thompson, "Systemic Change and the Latin American Military Coup,"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8, No. 1 (January 1975), p. 452.

註⑳ Ekkart Zimmermann, *Political Violence, Crises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Alfred Schenkman Publishers, 1979), pp. 105~112.



itimacy) 面臨嚴重挑戰。」^②換言之，集團利益遭受威脅誘發政變動機，而促使政變動機轉變為行動的關鍵是文人政府的合法性降低。

表一 跨國性政變分析研究舉隅

內容 \ 學者	湯湯普森 William R. Thompson	范納 Samuel E. Finer	簡諾維茲 Morris Janowitz	歐肯 Rosemary H. O'Kane
發表時間	1973	1976	1977	1987
研究期間	1946~1970	1958~1973	1945~1975	1950~1985
國家數目	59	51	52	67
政變數量	274	130	128	144
政變結果	成功的政變(45.2%) 失敗的政變(47.8%) 妥協的政變(7.0%)	成功的政變(70%) 失敗的政變(30%)	成功的政變 失敗的政變(N.A.)	成功的政變 失敗的政變(N.A.)
地區比率	1 拉丁美洲(49.6%) 2 阿拉伯(19.3%) 3 亞洲國家(14.6%) 4 非洲國家(13.9%) 5 歐洲國家(2.6%)	1 阿拉伯(30.8%) 2 非洲國家(29.2%) 3 拉丁美洲(23.8%) 4 亞洲國家(10.8%) 5 歐洲國家(5.4%)	1 拉丁美洲(46.1%) 2 非洲國家(25.0%) 3 阿拉伯(21.1%) 4 亞洲國家(7.1%) 5 歐洲國家(N.A.)	1 非洲國家(36.1%) 2 拉丁美洲(25.3%) 3 亞洲國家(20.6%) 4 阿拉伯(17.9%) 5 歐洲國家(0.1%)
政變頻率	4.64 (per state) 10.96 (per year)	2.55 (per state) 5.21 (per year)	2.46 (per state) 4.27 (per year)	2.15 (per state) 4.12 (per year)

資料來源：參照 Ekkart Zimmermann, "Toward a Causal Model of Military Coups d'Etat,"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5, No. 3 (Spring 1979), pp. 387~391; Rosemary H.T. O'Kane, *The Likelihood of Coups* (Aldershot, U.K.: Avebury, 1987), pp. 141~144.

一、軍隊的集團利益

軍隊是一個具有高度凝聚力、團隊精神與紀律，並擁有巨大合法暴力機器的公共機構，因此在保護與提升集團利益方面的能力與效益是其他機構所無法比擬的。至於軍隊集團利益的內涵，主要有三核心項目：(一) 軍事預算的支持；(二) 軍事自主權的掌控；(三) 排除可能取代軍隊功能的勢力。

魯溫 (Edwin Lieuwijn) 的研究指出，政變之後軍事預算的增加，幾乎已成定律；

註② 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Press, 1977), pp. 74~80.



而政變發生與軍事預算的密切關聯性，並不僅適用於拉丁美洲國家。^②威爾奇（Claude E. Welch, Jr.）認為，國防開支的多寡，意謂軍隊政治權力的大小與威望的高低；而國防預算的消長也會影響軍人作為一個現代化專業組織成員的自我認同。^③比預算要求不滿足更容易刺激軍隊造反的，是文人政府對軍隊內部事務的干涉。史蒂潘（Alfred Stepan）認為，文人政府一旦干涉軍事領域（military domains）的事務，將使軍人認為集團利益遭受根本侵害而產生反擊的急迫感。

另一方面，狄卡羅（Samuel Decarlo）認為，除集團利益之外，個人利益的因素，例如軍人對升遷的期望或不滿、政治抱負，或擔憂遭到解職等，都可能是促使他們採取政變行動的因素。^④然而，諾德林格的研究則指出：個人利益（individual interests）這個因素在解釋菁英行為時固然比較重要，但在解釋軍官的干涉傾向與政變動機時，它的重要性卻不十分明顯。因為在軍事政變中，個人利益與集團利益兩個範疇有很大的重疊。^⑤簡言之，個人利益固然與政變行為有關，但在解釋政變動機時，集團利益卻更為重要與具代表性。

二、文人政府的合法性

經常被軍人用來為他們推翻文人政府行為辯護的理由有三：第一、文人政府有違憲或違法行為（特別是普遍存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腐敗現象）；第二、文人政府應對經濟衰退或通貨膨脹負責；第三、文人政府無法化解內部紛爭或社會動亂而引發執政危機。諾德林格的研究指出：文人政府貪污腐敗的違法行為以及對經濟問題的束手無策，一方面強化軍隊發動政變的決心，另一方面也降低政府本身的合法性。軍人視此種情勢消長為發動政變的最佳時機。^⑥

許多研究軍事政變的學者都同意，政府合法性的變化對於解釋政變的發生格外重要。甚至有學者宣稱：「政府合法性對軍隊干政的影響，遠大於任何其他的外部因素。」^⑦然而，雖然學界大都同意合法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卻也普遍缺乏解釋此種推論的依據。政府合法性與政變之間的關係為何？這是一個不易解答的問題。因為無論一個政府是非法的（illegitimate）、無合法性的（non-legitimate）或是合法的（legitimate），軍隊都有推翻它的能力；幾乎沒有任何文人組織有力量阻止一場軍事政變。因此，筆者對合法性因素的影響力提出以下假設：「文人政府合法性的存在，可以有力地防止政變動機轉化為政變行動；反之，合法性的缺乏、降低或喪失

註② Edwin Lieuwien, *Arm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1961), pp. 45~52.

註③ Claude E. Welch, *Soldier and State in Africa*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21~124.

註④ Samuel Decarlo, *Coups and Army Rule in Africa: Study in Military Styl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7~22.

註⑤ 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 p. 86.

註⑥ *Ibid.*

註⑦ Claude E. Welch and Arthur K. Smith, *Military Role and Rule: Perspectives o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North Scituate, Mass.: Duxbury Press, 1974), pp. 121~130.



則是導致此種轉化的最重要因素。」亦即，合法性的降低對政變行動是一項促進因素，而非本質因素。就政變實際過程觀之，合法性問題經常是「旁觀者」對政變發生的歸因；就政變「當事人」而言，合法性問題總是評估風險後，決定政變行動的一項合理化的藉口。

至於文人政府合法性與軍事政變之關聯性，范納的觀點是：「在文人政府具有民意向心力的國家，軍人企圖推翻政府將被視為篡位奪權的叛國行爲。正是這種道義上的障礙（barrier of morality），才能阻止具有嚴密組織、強大武力與崇高威望的軍隊發動軍事政變。」^②雖然學界對此說法抱持懷疑態度，^③但普遍肯定合法性因素的重要。只是在確立二者關聯性方面，我們不能忽略由於軍隊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本質差異，以及彼此的隔離（segregated）甚或脫離（isolated）的關係；公眾的反對聲浪在傳抵軍隊時往往已喪失部分的強度。換言之，「道義上的障礙」對預防政變具有重要意義，但卻不具決定性的意義。

三、經濟的低度發展

范納將經濟問題歸入文人政府合法性下降的原因之一，但許多學者的研究則視經濟的低度發展（economical underdevelopment）為刺激政變發生的一項獨立因素。以杭廷頓的觀點為例，他以個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per-capita GDP）為指標，提出政變發生與經濟發展之關聯性：「個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高於1000美元的國家不會有成功的政變，3000美元以上的國家不會有政變的企圖；介於1000至3000美元的國家會有不成功的政變發生，而在500美元以下的國家會有成功的政變。」^④此外，歐肯則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倚賴「出口集中」（export concentration）的程度愈高，則愈容易發生政變。^⑤因為專注出口會導致國家經濟對國際需求與物價波動產生依賴性與脆弱性，一旦出口情況惡化，將導致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失序，從而影響政治穩定；而出口情況愈具支配性，則發生政變的可能性愈高。綜合影響政變的發生的因素，筆者以圖一表示如下：

註② Samuel E. Finer, "The Morphology of Military regimes," ch.12 in Roman Kolkowicz and Andrzej Korbonski, ed., *Soldiers, Peasants and Bureaucrat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and Modernizing Societ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ress, 1982), pp. 223~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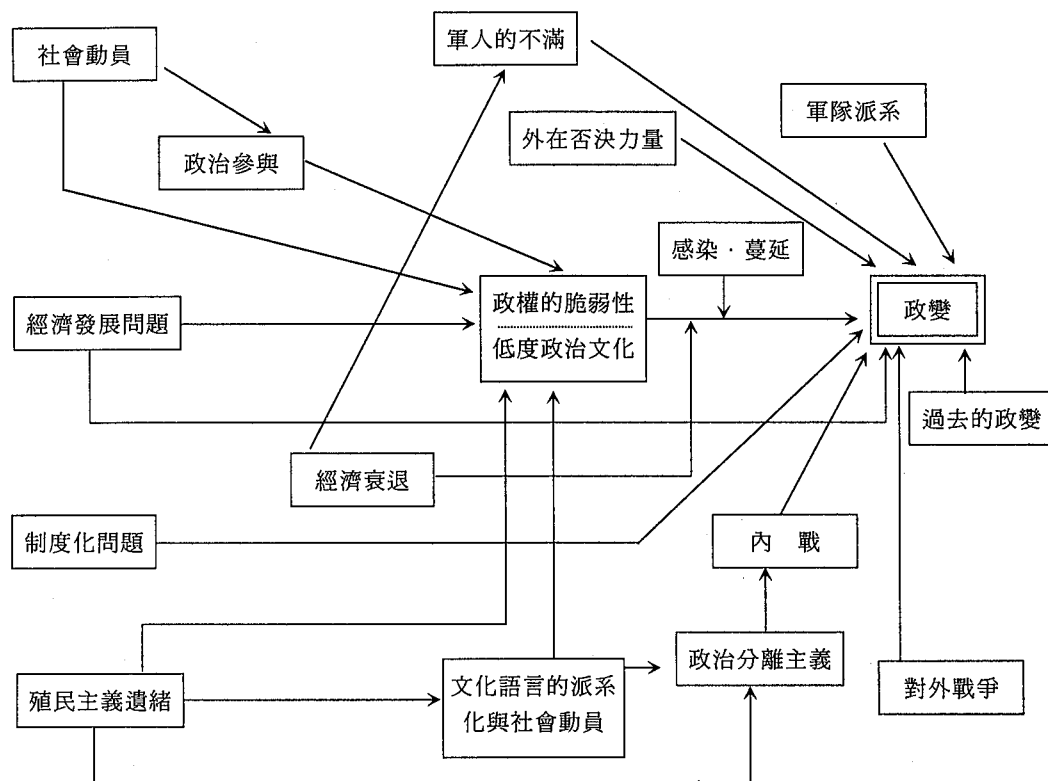
註③ 以諾德林格為例，他認為對政變動機構成制約的不是公眾輿論譴責造成軍人心理的「道義障礙」，而是這種譴責所呈現出的形態，如大規模罷工、暴動，甚至是武裝對抗，會帶來一段時間出現政治動亂的後果。因為軍人對政治秩序是高度期待的，軍人的政變行動以愛國與衛國為主要訴求，不願降低身分去扮演警察維護社會治安的角色。請參閱：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 p. 107.

註④ Samuel P. Huntington, "Reforming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6, No. 4 (October 1995), pp. 18~21.

註⑤ Rosemary H. T. O'Kane, *op. cit.*, pp. 43~50.



圖一 政變原因的綜合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繪圖。參考 Ekkart Zimmermann, "Toward a Causal Model of Military Coups d'Etat,"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5, No. 3 (Spring 1979), p. 98.

叁、「政變」與泰國政治

泰國自一九三二年「六月革命」推翻絕對君主體制、採行立憲政體迄今，共發生了 23 次政變。^②（表二）

「政變」一詞在泰國有若干不同的稱謂，例如「革命」（*patiwat*—revolution）、「政變」（*ratapraharn*—coup d'etat）、「奪權」（*yut amnat*—seizure of power）以及「反抗」（*kabot*—rebellion or attempted coup）。^③名稱雖有不同，但型態卻是一致的，亦即武力與暴力的使用；而其間唯一的差異，就在使用武力與暴力的程度。

註② 關於泰國 1932 年後發生政變的次數，論者各有不同的統計數據。本文統計的 23 次係包含非軍事的政變在內；這也是許多泰國學者採用的數字。

註③ 關於這些用語請詳見：David Wilson, *Politics in Thai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54~262; David Morell and Chai-anan Samudavanija,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ailand* (Massachusett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Publishers Inc., 1981), pp. 28~29. 以及 Supaluck Suvarnajata, "The Thai Military Coup d'Etat: Origins, Withdraw, Civilian Control and Perspectives" (Ph.D. dissertation, The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1994), p. 40.

表二 泰國歷次政變（1932~1991）

	政變年代	政變者身分	結果	傷亡	是否執政	政權移轉情形
1	1932.06.24	陸軍校官·文人	成	否	否	(文人)委任曼諾出任總理
2	1933.06.20	陸海軍校官·文人	成	否	是	(軍人)帕洪上校出任總理
3	1933.10.11	國防部長	敗	是()	否	
4	1935.08.03	陸軍士官	敗	否	否	
5	1938.01.29	陸軍將官	敗	是(0)	否	
6	1947.11.08	陸軍將官	成	否	否	(文人)委任寬恩出任總理
*7	1945.02.28	文人—國會議員	敗	否	否	
8	1948.04.06	陸軍將官	成	否	是	(軍人)披汶將軍出任總理
9	1948.10.01	陸軍將官	敗	否	否	
10	1949.02.26	中級文官	敗	否	否	
11	1951.06.29	海軍校級軍官	敗	是(68)	否	
12	1951.11.29	陸軍參謀長	成	否	否	(軍人)委任披汶續任總理
*13	1954.11.0	文人—左派勢力	敗	否	否	
14	1957.09.16	陸軍總司令	成	否	否	(文人)委任乃帕出任總理
15	1958.10.20	陸軍總司令	成	否	是	(軍人)沙立將軍出任總理
16	1971.11.17	總理	成	否	是	(軍人)他儂將軍出任總理
*17	1973.10.14	文人—學生暴動	成	是	否	(文人)委任桑亞出任總理
18	1976.10.06	國防部長	成	否	否	(文人)委任他寧出任總理
19	1977.03.26	陸軍副參謀長	敗	是(1)	否	
20	1977.10.20	國防部長	成	否	否	(軍人)委任克里安薩將軍出任總理
21	1981.04.01	陸軍副總司令	敗	是(2)	否	
22	1985.09.09	武裝部隊最高統帥	敗	是(5)	否	
23	1991.02.03	武裝部隊最高統帥	成	否	否	(文人)委任阿南德出任總理

作者製表：()內數字表示死亡人數。以 * 表示之三次政變為非軍事政變，研究者多不列入；然根據泰國眾議院秘書處之出版文件，則列入政變記錄。

資料來源：Leuktung-Rataprahan munag Thai - 2536 (Elections and Coups d'Etat in Thailand - 1993),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to the Parliament, Thailand, 1993; Chai-Anan Samudavanija, *The Thai Young Turks* (Singapore: ISEAS Press, 1982), p. 4; Somboon Suksamran, *Military Elites in Thai Politics* (Singapore: ISEAS Press, 1984), pp. 3~89; 陳鴻瑜, 「泰國的軍人與政治變遷」, 東亞季刊, 第24卷第3期(民國82年1月), 頁2。



泰文「革命 (*patiwa*)」的意涵與一般廣泛指稱的意義有相當出入。史柯奇波 (Theda Skocpol) 認為：「革命火燄的點燃者多為都市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與工人，但事態的擴大、演變、乃至於最後能否成為真正的社會革命，則往往取決於當時農村的社會結構。」然而，一九三二年的「六月革命」雖名為革命，實為政變；因為政變發動者並未對當時的社會結構造成明顯的轉變，且缺乏群眾的參與以及暴力的廣泛使用。而政變者以革命為名包裝政變行動的主要目的，是將政變行動描繪成一場彰顯人民力量與革命熱忱的大行動；換言之，這只是一種「政治辭令」(political discourse) 的使用而已。^④

泰文「政變 (*ratapraharn*)」一詞的意義與一般的認知亦有差距。日籍學者塚藤 (Somsakdi Xuto) 指出：「泰國的政變目的不在「終結」(execute) 國家，而在改造 (modify) 政治結構與修改 (adjust) 憲法。」^⑤政變者並未動員廣大的群眾，政變行動亦未造成社會階級結構的重組，因政變而受到直接衝擊的只有政府組織與執政集團。政變成功者可能組成新政府並由政變領袖出任主要職位，例如披汶與沙立分別在一九五一年與一九五八年的成功政變後出任總理；此外，政變領袖亦可能在選任一位文人籌組新政府後重回部隊。簡言之，泰國的「政變」一詞意謂著對執政的總理及其政府的改變。

另一詞彙「奪權 (*yut amnat*)」經常在政變者為避免使用如 *patiwa*、*ratapraharn* 等強硬字眼的情況下，被用來指稱政變。「*yut amnat*」意謂著以不流血的方式將政權由執政者轉移至軍事執政團 (military junta) 的過程。政變者強調和平的取得政權，試圖擺脫政變給人的負面印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政變被稱為「寧靜」政變 (silent coup)，政變領導人則稱之為「*yut amnat*」。^⑥最後，對於失敗的政變，泰國亦有「反抗」(*kabot*) 的不同稱謂。

根據筆者的觀察，泰國政變在時間序列上呈現出「間歇性」與「階段性」的特點。

由政變發生的頻率來看，一九三二至一九九一年的六十年期間，有三次時間間隔較長的政變「間歇期」：第一次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七年；第二次是一九五八至一九七一年；第三次是一九九一年迄今。這三次政變「間歇期」凸顯了泰國政變三個不同的「階段」。(表三)

第一個間歇期主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泰國國內因為參戰與同盟問題而分裂，外部環境的危機使頻仍的政變循環中輟。第二個間歇期係因沙立與他儂政權塑造出一個具封閉性的官僚政體；體系內部的軍事統治基礎穩固，外部力量薄弱而無法衝擊體系，政變因此難以發生。第三個間歇期起因於官僚政體外部力量的崛起，衝擊體系內部的軍事統治型態，形成促使軍人脫離政治的壓力。

註④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2~55; Supaluck Suvarnajata, *op. cit.*, pp. 40~41.

註⑤ Somsakdi Xuto,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aila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2.

註⑥ David Morell and Chai-anan Samudavanija,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ailand*, p. 31; Supaluck Suvarnajata, *op. cit.*, p. 41.



表三 泰國政變頻率表(1932~1991)

序次	政變日期		距前次政變的時間	
	年代	月份	年	月
1	1932	06	-	-
2	1933	06	1	-
3	1933	10	-	4
4	1935	08	1	10
5	1938	01	2	5
6	1947	11	9	10
7	1948	02	-	3
8	1948	04	-	2
9	1948	10	-	6
10	1949	02	-	4
11	1951	06	2	4
12	1951	11	-	5
13	1954	11	3	-
14	1957	09	2	10
15	1958	10	1	1
16	1971	11	13	1
17	1973	10	1	11
18	1976	10	3	-
19	1977	03	-	5
20	1977	10	-	7
21	1981	04	3	6
22	1984	09	3	5
23	1991	02	6	5
			50	104
總計			58	8
頻率			2.56 (year / c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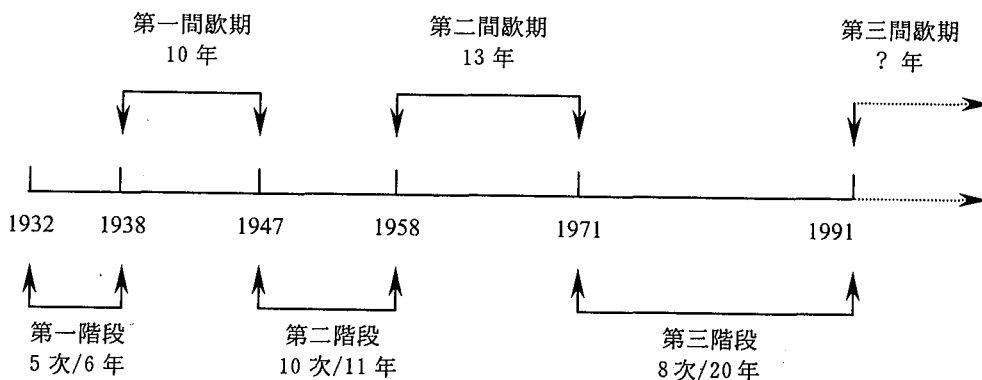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頻率依表二計算而得。

三個「間歇期」區隔出泰國政變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32~38）的5次政變、第二個階段（1947~58）的10次政變、第三個階段（1971~91）的8次政變。上述三個階段，除了時間的區隔外，這種區分在分析政變發生的原因與影響



政變成敗的因素方面，亦有其意義；尤其以後者為然。筆者以圖二呈現此一概念。

圖二 泰國政變的間歇期與階段區劃



資料來源：表三

在政變的發生原因方面，陳鴻瑜曾對泰國 19 次軍事政變進行研究，歸納出七項因素：一、軍人對削減國防經費的不滿；二、軍人與文人對憲政的觀點不同而發生衝突；三、軍中派系鬥爭的結果；四、軍方為保護自身利益的行動；五、軍人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干涉政治；六、軍人以經濟惡化為藉口干涉政治；七、軍人的政治使命感以及對干政能力的自信。^⑦以這七項因素對照前述「三階段」政變，可以歸納出以下脈絡：第一階段政變的原因主要是軍人與文人政府無法形成憲政共識，文人政府以刪減國防經費等方式貶抑軍人，軍人則以文人政府無能為由發動政變。第二階段政變的原因主要是軍方反制文人政府對軍事領域的干涉，以及藉口政府無法解決經濟惡化的問題而發動政變。第三階段政變的主因在於軍方內部派系化形成集團鬥爭，以及軍人以維護國家安全以及終結政府貪污為由，發動政變。

從政變成因的角度來看，上述的脈絡尚無法充分顯示出政變三階段的重要性；然而，若就影響政變成敗因素的分析而論，三階段區隔的意義就獲得彰顯。就影響政變結果的因素而言，第三階段政變與第一、二階段的政變有根本的差異。第一與第二階段政變的成敗因素取決於官僚政體內部軍人與文人關係的互動，官僚政體外部力量幾乎與政變的結果無涉。一九五八年沙立政變成功後，尋求泰王蒲美蓬（King Bhumibol Adulyadej）的支持以獲得政權的合法性，建立父權主義型態的統治（1959~63），而泰王對政變的支持賦予一九五八年政變的結果長達十三年的穩定性，這也造成第三階段各次政變中，泰王的態度對政變的成敗具有關鍵性的作用。此外，一九七三年學生

註⑦ 關於泰國歷次軍事政變（不含非軍事政變）的經過、特點與成因，請參閱：陳鴻瑜，「泰國的軍人與政治變遷」，頁 22~24。

暴動事件開啓了社會力量挑戰官僚政體的序幕，其後隨著中產階級的茁壯與非政府組織的擴張，政變的行動受到官僚政體外部力量制約的程度與日俱增。這種趨勢反映出：泰王態度與群眾運動是第三階段政變結果的決定性因素。

因此，探討以下三個問題就顯得十分重要：一、為何泰國軍事政變頻仍，且持續構成泰國政治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二、泰國軍事政變結果的成功或失敗，決定性的因素有哪些？而政變成功後的政權移轉形態各異，原因為何？三、頻仍的政變對泰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造成哪些影響？這些效果是否形成反饋效應，致使爾後政變的困難度提高？

問題一可以簡約為政變成因的綜合探討；問題二、三則涉及政變結果與影響的分析。

肆、軍事政變的成因

泰國軍人介入政治的起源可以區分為兩種形式：「軍事支配」(military dominance)與「軍事影響」(military influence)。就軍事支配政治層面而言，根據威爾奇(Claude E. Welch, Jr.)與史密斯(Arthur K. Smith)的說法：政變是當代最被普遍接受的軍事支配政治的型態。^③

依據猜安南(Chai-anan Samudavanija)與素契(Suchit Bunbongkarn)的看法，泰國軍事統治的演變可以區分為不同的階段；雖然不同階段的軍人統治型態互異，但只有從「支配」與「影響」這兩種權威觀點進行分析，才能明瞭泰國軍人與文人的權力關係形態。^④即使泰國軍事將領在政變成功後決定重回部隊，但軍人對政治的影響力與支配性仍能滲透入新成立的軍文聯合政府；換言之，軍人隱藏在文人政府之後，扮演仲裁者或保護者的角色。素帕拉(Supaluck Suvarnajata)有關泰國軍事政變的論文，是目前對泰國政變成因理論探討最完整的研究之一。^⑤筆者即針對素帕拉引述的理論做進一步的解析，並提出筆者不同的看法。

前文提及的齊瑪曼綜合因素模型，素帕拉認為並不完全適用於泰國政變發生原因的解釋；因為外在的否決力量與殖民主義的遺緒這兩項齊瑪曼所重視的重要因素，在泰國的實例中卻根本不構成任何影響。在泰國政治體系中，政變的頻仍發生造成政治體制(political institutions)施政計畫的遲緩以及對責任政治的無力感；面對軍人強大且持續的壓力，脆弱的政治體制明顯地缺乏抵抗的能力與意志。筆者同意此一論述，但齊瑪曼模型中尚有一具普遍性的重要因素「經濟發展的衰退」，在泰國的個案中卻

註③ Claude E. Welch, Jr. and Arthur K. Smith, *Military Role and Rule: Perspectives o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p. 8.

註④ Chai-anan Samudavanija and Suchit Bunbongkarn, "Thailand," in Zakaria H. Ahmad and Harold Crouch, eds., *Military-Civilian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7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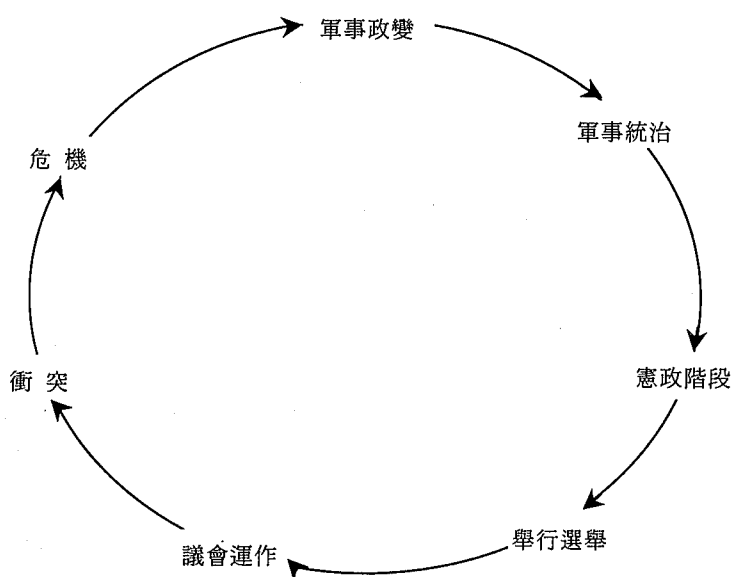
註⑤ Supaluck Suvarnajata, *op. cit.*



不顯著。^④泰國軍事政變的發生與整體經濟情勢的榮枯並無關聯性，此一特徵稍後再行說明。

換言之，軍事政變是泰國政治過程中軍人與文人關係互動中的一環；立基（Likhith Dhiravegin）與猜安南稱此種政治過程為「惡性循環」（vicious cycle or vicious circle）。^⑤（圖三）猜安南對泰國的政治過程有如下的闡述：「成功的政變通常導致廢止憲法、解散國會以及中止政治參與。然而，幾乎在每次成功的政變後，軍方都會重建某種形式的憲政架構與議會運作。在這種軍人設計來合法化自己政治權力的政治體系中，行政部門多受軍方掣肘，國會議員多數由軍方任命，軍人稱之為『泰國式民主』。文人與軍方在短暫的蜜月期之後，很快地便產生憲政危機，並為下一個政變創造有利條件。」^⑥這充分顯示軍人透過政變的手段決定憲政的開始與結束，並在政治過程中居於支配的地位。

圖三 泰國「惡性循環」的政治過程



資料來源：作者繪圖參照 Likhith Dhiravegin, *Demi-Democracy: The Evolution of the Thai Political System*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p. 147.

註④ Supaluck Suvarnajata, *op. cit.*, pp. 52~53.

註⑤ Likhith Dhiravegin, *Demi-Democracy: The Evolution of the Thai Political System*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p. 147. Chai-anan Samudavanija, *The Thai Young Turk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2), pp. 1~5.

註⑥ Chai-anan Samudavanija, *The Thai Young Turks*, pp. 1~2.

針對「惡性循環」的政治過程，筆者進一步說明如下：

泰國軍方在成功發動政變後，軍事菁英通常會掌控政治權力一段時間，然後組成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的總理可能是軍事將領或委由具崇高聲望的文人出任。聯合政府隨即公布憲法，並接著舉行大選。大選結束後由參、眾兩院議員組成政府。新政府成立一段時間（所謂的「蜜月期」）之後，接踵而至的各種衝突^④將可能升級為政治危機，嚴重阻礙新政府的正常運作。政府的效能不彰、貪污腐敗，以及兩院的權力衝突，導致政治體系呈現失序狀態。在這種狀況下軍方的態度就成為左右政局發展的關鍵因素，但此時軍方的態度經常是曖昧的。若軍方立刻宣布介入，則軍人在政治體系內的影響力足以遏阻政治衝突的惡化；但軍方經常等待情勢惡化成為政治危機之際，才順應輿情出面恢復政治秩序。國家安全是軍人以政變形式介入政治的最佳理由。因此，「惡性循環」的過程繼續推進，危機的下一個階段——「政變」也就無可避免。

上述猜安南與立基的「惡性循環」模型經常被引用做為解析泰國政變頻仍現象的依據；其論點似乎在強調泰國政治體系運作發生的衝突，而這些衝突的結果導致軍事政變，造成政治制度的終結。然而，筆者贊同素帕拉的看法：「猜安南與立基忽略了泰國政變的發生情形與原因；而泰國政變的發生似乎符合湯普森的論點。」湯普森提出了四種導致政變發生的途徑：^⑤

- 一、政權脆弱性（regime vulnerability）的「拉力」（pull）
- 二、軍事次體系（military subsystem）的「推力」（push）
- 三、世界體系及其次體系的「推力與拉力」（push and pull）
- 四、政變者的困境（coup-makers' grievance）將「推力」轉變成「撞擊力」（push-comes-to-shove）

根據湯普森的論點，政權脆弱性係指政權結構與領導階層的弱點，此種脆弱性與政府組織的功能遲緩與社會經濟的低度發展有關；政權的脆弱性將對軍人產生「拉力」，使其發動政變。其次，湯普森的所謂「推力」是指軍事組織的力量呈現出相對於執政當局的優越性，促成軍人發動政變。再者，國際環境中政變的普遍現象會對一個國家的軍人產生「感染」（contagion）作用，^⑥使渠等產生「複製」（duplicate）政變的動機，即湯普森所謂的「推力兼拉力」。最後，政變企圖是否最終付諸行動，取決於政變者在充分明瞭政變的風險與後果後孤注一擲的決定，這種困難的抉擇就是政變者的困境；然而一旦下定決心後，政變行動就已箭在弦上，此即湯普森所謂的撞擊力。

泰國自一九三二年以來，大部分的軍事政變都符合上述湯普森論點的第一、二、

註④ Likhith Dhiravegin 將泰國政治體系內的衝突區分為五種類型：一、政治領導階層的權力爭奪；二、對重大政經政策的意見分歧；三、新舊政治勢力的衝突；四、軍方內部派系的衝突；五、軍方（特別是陸軍）、警察系統與文人政客之間的衝突。請參閱：Likhith Dhiravegin, "The Postwar Thai Poli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11 (Bangkok: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Thammasat University, 1986), pp. 40~42.

註⑤ William R. Thompson, *The Grievances of Military Coup-Makers*, p. 5.

註⑥ 關於政變的蔓延或感染，齊瑪曼的政變綜合模型亦提及；請參閱圖一。



四項。至於第三項的外在環境因素則只有一九三二年政變符合。這也呈現出泰國政變不受外在環境影響而成爲政治過程一環的特殊性。

本章前言部分曾就相關政變研究進行文獻探討，歸納分析政變成因的三個面向——「軍隊集團利益」受損、「文人政府合法性」降低、「經濟的低度發展」的刺激。茲就此三項指標爲「經」，湯普森的分析層次爲「緯」，以立基與猜安南的「惡性循環」政治過程爲序列，筆者嘗試進行以下析論，以建構泰國政變發生原因的綜合模型。

就軍隊組織的集團利益而言，據諾德林格認爲有四項主要內涵：預算支持、軍事自主、排除職能對手、以及軍人的基本生存權。^④換言之，軍事菁英視軍事預算的裁減、文人干涉軍隊內部事務、民兵規模的擴增以及正規部隊的大幅縮編爲集團利益的嚴重損害，是軍人發動政變主要原因。

以泰國的個案而言，國防預算的變動與政變的發生二者並無密切的關聯性；而政變亦鮮少肇因於文人對軍隊事務的干涉與政策的緊縮。此外，就整體經濟情勢的榮枯而言，杭廷頓以個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爲指標對政變發企圖與結果的假設並不適用於泰國；而整體經濟表現的優劣也與泰國政變的發生無明顯關聯。（表四）

相較於前兩項的低度關聯性，文人政府合法性降低的因素相對顯得重要；以泰國的個案而言，這一因素層面表現在「政治制度的結構脆弱與缺乏效能」。更具體而言，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落是造成文人政府脆弱性的關鍵因素，也是軍人據以判斷文人政府無能力解決危機的依據；這也將驅使軍人以文人政府合法性降低爲藉口而發動政變。以下即就此一層面分析泰國政變的發生原因。

就泰國軍人長期支配政治的現象而言，政治制度化的低落是最關鍵的因素；而對此一問題，筆者曾爲文指出：「政黨體系的缺陷與政黨政治的空洞化是泰國政治制度化的最大障礙。」^⑤白魯恂（Lucian W. Pye）在論及東南亞政治體系時曾言：「東南亞國家的政黨無法發揮一般西方政黨之功能，主要是一直未能克服一個基本問題：政黨無法將統治階層與一般民衆有效地聯結。政黨在政治參與方面的作爲不足以推動政治制度化，卻足以在統治階層中造成分裂。」^⑥泰國的個案充分印證了這一推論。

另一方面，泰國軍人長期支配政治的現象也符合杭廷頓的說法：「傳統的君主國家中，政黨體系是薄弱、甚至於不存在的。而在一個缺乏殖民經驗的社會裡，則不易激發大規模群眾運動，也不利於政黨的發展。」^⑦此外，威爾森（David A. Wilson）的分析指出：泰國政治是官僚政體（bureaucratic polity）內部軍人與文人兩大集團的

註④ 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 pp. 66~78.

註⑤ 參閱陳佩修，「泰國政黨政治之發展及其特質」，東南亞季刊，第1卷第4期（民國85年10月），頁95~96。

註⑥ Lucian W. Pye, *Southeast Asia's Political System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ress, 1967), pp. 55~57.

註⑦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81.



權力競爭，而所謂政黨政治運作也只是文人與軍事菁英間的派系衝突而已。^①這一論點也獲得雷格斯（Fred W. Riggs）的支持。^②

表四 泰國政變與國防預算、經濟成長率、個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對照表

年年代	有否政變	國防支出額度 (單位：百萬美元)	國防支出比例 (% of GDP)	PER CAPITA GDP (單位：美元)	GDP 成長率 (%)
1972		564	3.5	720	4.1
1973	有	531	2.9	764	9.9
1974		499	2.7	789	4.4
1975		679	3.5	803	4.8
1976	有	738	3.5	832	9.4
1977	有	828	3.3	884	9.9
1978		842	3.3	905	10.4
1979		972	3.6	932	5.3
1980		949	3.4	975	4.9
1981	有	1036	4.8	980	7.6
1982		1895	4.9	1010	6.0
1983		2031	5.0	1024	5.8
1984	有	2174	5.0	1035	5.5
1985		2240	5.0	1040	3.5
1986		2182	4.7	1046	4.5
1987		2181	4.3	1065	8.4
1988		2161	4.0	1150	11.0 (12.7)
1989		2146	3.2	1270	10.8 (11.5)
1990		2301	3.2	1386	10.0 (10.5)
1991	有	2505	3.1	1480	7.9
1992		2293	2.8	1590	7.2
1993		2712	3.2	1705	7.9
1994		2793	3.1	1830	8.8
1995		2563	2.8	1924	8.7

說明：1. 1972~1980以1980年匯率計算、1981~1988以1988年匯率計算、1989~1995以1990年匯率計算。

2. GDP及PER CAPITA GDP以REAL GDP為準，匯率以泰京盤古銀行的年均匯率表為換算依據。

3. GDP成長率以世界銀行資料為準，()內是泰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局的數據，差異在0.5%以上者。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參照 *SIPRI Yearbook of 1981*、*SIPRI Yearbook of 1992*、*SIPRI Yearbook of 1997*；World Bank, *World Tables*, Various Issues;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 *National Income of Thailand*, Various Issues; 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Thail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Kit*, March 1997; Bank of Thailand, *Monthly Bulletin*, Various Issues.

註① David A. Wilson, *Politics in Thailan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77.

註② Fred W. Riggs, *Thail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a Bureaucratic Polity*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Press, 1967), p.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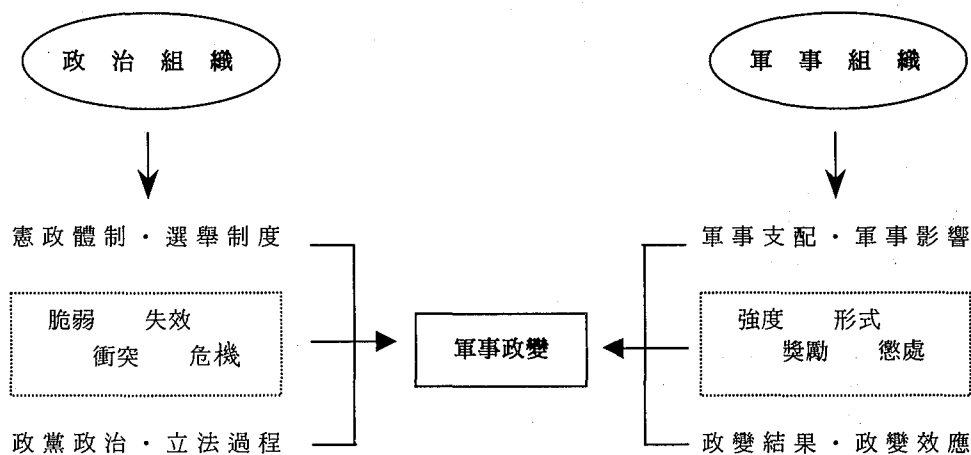


因此，喀莫（Kramol Tongthamachart）認為：「泰國的政黨並不具備真正的政黨條件，充其量只是政治派系組織而已。」^⑤泰國的政治衝突經常是以政治人物為主體，而非政黨間的對抗形態。因此，當官僚政體的外部力量（政黨、壓力團體、非政府組織等）未能整合之際，一旦官僚政體內部爆發衝突，體系內最具組織優勢的軍人擁有全面壓制其他派系的力量，政變因而成為迅速解決衝突的方法。官僚政體內部衝突不斷，軍事政變也因而頻仍發生。

筆者認為：「由於政黨體系功能不彰造成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落，以及民衆缺乏政治意識形成低度的政治參與，賦予泰國軍人以政變方式支配政治的有利環境。」政治制度化的問題已分析如上，關於政治參與的問題，素契的論點值得參考：「泰國人民並不關心政治菁英間的權力競爭，除非這種衝突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方式。即使有機會，他們也認為沒有必要參與政治活動。就那些前往投票的人而言，大多數的投票動機不在於對政策路線表達意見，而係各種『人際關係』的緣故。買票、私人情誼、軍方動員等都是選民前往投票的因素；這種政治態度使軍人在政變奪權或干涉政治時少了後顧之憂。」^⑥

不論政黨體系或政治人物都無法對軍人支配政治構成障礙，加上政客或政黨經常拉攏軍方以壯聲勢，泰國軍人可以毫無阻礙地決定干涉政治的程度與方式。因此，一旦政變發生，人民或政治人物的態度與反應似乎早已視政變為一種正常的政治行為；在這種將軍事政變「政治化」的環境中，政變可能在任何時間下發生。這顯露出泰國政變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據此，筆者嘗試建構泰國政變成因的分析模型如圖四。

圖四 泰國政變成因的分析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參照猜安南一立基的「惡性循環」政治過程論、湯普森的「推—拉」次體系之概念、齊瑪曼的政變成因「綜合模型」，以及素帕拉的論點所繪製。

註^⑤ Kramol Tongthamachart, "Toward a Political Party Theory in Thai Perspective," *Occasional Paper*, No. 68 (Singapore: ISEAS & Maruzen Asia, 1982), p. 39.

註^⑥ Suchit Bunbongkarn, *The Military in Thai Politics, 1981~1986*, p. 3.

圖四將泰國軍隊自傳統以官僚政體為主的國家機關 (state apparatus) 概念中抽離出來，就組織結構與功能運作兩方面，進行政治部門與軍事部門的對比，藉以探討做為兩組織間動態連結的軍事政變之成因。

泰國是君主立憲內閣制，但卻迥異於一般內閣制國家的憲政體制。首先，泰王名義為「統而不治」但卻非內閣制的虛位元首，而是泰國政治中的參與者，且擁有極高的政治權威。其次，泰國的政黨政治體質十分脆弱，多黨體系呈現高度不穩定的狀態。^⑤泰國政黨在組織方面是以政客同儕關係為基礎，而非以廣大群眾為基礎；在運作層面則以自身利益為導向，而非公共政策導向。另一方面，泰國政黨體系「量多、規模小、黨紀不彰」的基本格局一直未有效改善，聯合政府呈現高度不穩定性。政黨體系的脆弱與立法過程的失效是政治衝突與危機的濫觴；也是誘發政變的主要因素之一。

相較於政治組織的脆弱結構與衝突過程，軍事組織展現堅強的結構與賞罰分明的紀律，透過對政變進行對政治的支配，並維繫政變在政治過程中的效應，對政治保持長期的影響力。

前文已就分析泰國政變成因的三個面向進行討論。誠然，政變成因的分析是研究者最重視的主題，也是成果最豐碩的部分；然而，亦誠如前文所言，政變的結果（成敗）與政變所造成的影響（效應）理應獲得等量的重視與研究，方能對政變與泰國政治之關係，尤其是軍人—文人關係，有較全面的掌握。

伍、軍事政變的結果

學者探討泰國政變的成因多以雷格斯的「官僚政體」概念為基礎，著重於軍事菁英與文人菁英間的權力互動；誠然，官僚政體在分析泰國傳統政治與軍文關係方面，有相當的貢獻。然而，泰國自一九七三年事件後的一個明顯的政治發展趨勢，是官僚政體外部力量對政治的影響力益形重要；對研究泰國政變而言，此一趨勢尤適用於影響政變結果因素的探討。根據筆者在泰國進行訪問的歸納：泰王對政變的立場、非政府組織（特別是學生組織、工會）以及大眾媒介的角色，是一九七三年以後影響泰國政變成敗的決定性因素。^⑥

註⑤ 泰國政黨的起源與發展迥異於西方內閣制國家。泰國係以法律（憲法以及 1955、1968、1974、1981 年的政黨法）規定候選人必須隸屬政黨始得參選，缺乏政黨政治文化，造成選前政黨林立，選後當選者仍舊依據政商利益網絡結盟論政，許多政黨在選後即告瓦解。參閱：陳佩修，「泰國政黨政治之發展及其特質」，頁 91~93。

註⑥ 筆者於 1998 年 2 月 1~6 日於泰京曼谷對具有 20 年以上泰國政治採訪經驗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及政治觀察家進行一系列「泰國軍人政治」的專題訪問，對象如下：星暹日報總編輯 Mr. Thavee Yodpetch (馬耀輝)、世界日報採訪主任 Mr. Charn Aswaruangpipop (馬振英)、世界日報僑團新聞服務組主任 Mr. Be Suang Pheng (馬宣平)、事業機構 G.H.K. International Co., Ltd. 負責人 Mr. Jen Sukchongchaipruk (羅陳真)。

一、泰王角色與政變結果

在一九三二年「六月革命」廢除絕對君主體制改採君主立憲政體，但泰王仍是國家統一的象徵以及政治體系內合法性的主要來源。^⑤依據泰國憲法的精神，泰王的角色是「統而不治」(to reign but not to rule)；然而，做為國家元首的泰王，在實際政治過程中卻無可避免地關心、接觸與介入。泰王的政治影響力經由不同的政治溝通管道逐漸擴張，例如：憲法條文賦予的任命內閣總理與政府高階文官的權力，以及實際政治中決定是否給予軍事政變領袖合法性的認可。

在拉瑪七世巴差特樸統治期間(1925~1935)，一九三二年稱為「六月革命」的政變終結了絕對君主政體，開展憲政。拉瑪七世拒絕採納王室顧問所提對政變團發動反擊的建議，傾向與政變者談判以避免流血事件擴大，危及暹羅人民與國家。在政變的翌日，泰王決定應政變領袖之邀出任立憲君主。泰王在致政變領袖的信函中表示：「我願意接受你們的邀請返回曼谷擔任憲法體制內的君主……如果我不繼續在位，新政府可能無法獲得外國的承認……。」^⑥

拉瑪七世對政變的態度對爾後的一連串政變具有重大的影響。筆者注意到一個現象，大多數成功的政變者都會請求泰王對政變行動的原諒；這種舉措的目的是為建立政變行動與結果的正當性，因為獲得泰王的認可意謂著隨後人民對政變的默許。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要求泰王原諒或赦免的行為，雖然顯示政變者對泰王的尊重，但並不代表政變者認同泰王新角色的權威。這由「第一階段政變」中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一九三三年的政變中，泰王表達對復辟政變的支持態度，但為執政政府所反對，導致拉瑪七世的出國並於一九三五年宣布退位。

拉瑪七世時期泰王角色與政變結果之間並無必然的關係。泰王對一九三二年政變的支持係著眼於國家穩定與王室的續存，並冀望立憲政體下的泰王角色在國家統治上仍然具有影響力；一旦希望落空，泰王對一九三二年政變者的憎恨就顯露出來了。拉瑪七世遜位聲明中最經常被引用的一段話：「……吾人樂意將統治(暹羅)的權力轉交給全體(暹羅)人民；然而，吾人不願意將這項權力賦予任何一個具有權力慾、無視人民心聲的個人或團體……。」^⑦可資佐證。

拉瑪七世退位後，國會選擇王室中年僅十歲的王子亞難陀(Ananda Mahido)為第八世王，並委任乃比里(Pridi Phanomyong)等三人組成攝政團，以泰王名義行使

註⑤ David Morell and Chai-anan Samudavanija,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ailand*, p. 4.

註⑥ Sathon Supasophon, "Hetkarn nai nung one, yeesib see mithunayon songsee jedha, [One Day in Action: 24 June 1932]," *Political Science*, Vol. 17 (Bangkok: Thammasat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

註⑦ 拉瑪七世遜位聲明參閱 "King Prajadhipok's Abdication Announcement - March 2nd 1935, Signed at Noel, Cranleigh, England," in *Important Documents in Thai History* (Bangkok: National Library of Thailand, 1998), pp. 120~122.



王權。⑩拉瑪八世於一九四五年親政，但在軍人與文人爭權的政府中，泰王的政治角色並不顯著。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拉瑪八世遭暗殺身亡，攝政團與政府選任王弟蒲美蓬為第九世王。

拉瑪九世於一九五〇年正式登基後，泰王的政治權力並不明顯；但做為國家統一象徵的角色，仍使泰王具政治影響力。沙柯（Thak Chaloemtiarana）認為：「在披汶政權的獨裁統治型態下（1946~1957），泰王無法對政治事務表達意見；在政變接連不斷的政治衝突過程中，泰王並不具有決定政變成敗的影響力。」⑪然而，儘管泰王的政治角色是中立的，但泰王對政治仍具影響力。察立達通（Chalidaporn Songsamphan）的研究指出：「泰王（拉瑪九世）初期的政治角色彰顯在文化與心靈的層面。對軍事政權而言，他們仍須依附泰王權威以凸顯統治人民的正當性；而泰王在社會文化的權威對軍人形成一種心理上的制約。」⑫

筆者同意上述的論點。因為在「第二階段政變」事件中，泰王的態度尚未成為政變成敗的決定性因素，係因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一年期間的六次政變發生時，泰王尚在瑞士，並未返回泰國。⑬泰王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返抵曼谷後，隨即在憲政的議題上展現政治影響力，十二月七日泰王正式宣告一九三二年憲法恢復實施，也意謂著重振君主立憲政體下的王權。⑭

泰王對政變的決定性影響力首度展現在一九五七年的政變。當沙立與披汶、乃拋（Phao Suriyanand）爭奪對軍隊控制權的過程中，沙立積極拉攏泰王以為奧援。根據寇布夸（Kobkua Suwannathat-Pian）所著披汶傳記的說法，沙立公開宣稱：「雖然（1932年）憲法規定泰王是統而不治的，但我（沙立）主張英明的泰王除了象徵性的地位之外，也應具有實際的統治權力。」⑮沙立政變成功後，一改披汶政權孤立泰王的政策，開創軍事強人與泰王之間的「和諧共治」關係。漢納（Willard A. Hanna）指出：「泰王與沙立間達成一種令人驚訝的密切關係……沙立似乎認為一個廣受人民愛戴、甚至擁有實權的泰王符合國家與他個人的利益的；因此，他排除了許多對泰王的限制，泰王從此享有行動的自由……。」⑯筆者的一個觀察可以印證漢納的說法：

註⑩ Frank C. Darling,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5), p. 29.

註⑪ Thak Chaloemtiarana, *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Despotic Paternalism* (Bangkok: Thai Khadi Institute, Thammasat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94.

註⑫ Chalidaporn Songsampha, "Supernatural Prophecy in Thai Politics: The Role of A Spiritual Cultural Element in Coup Decisions" (Ph.D. dissertation,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1991), p. 62. Also, Supaluck Suvarnajata, *op. cit.*, pp. 40~42.

註⑬ 依據泰國王室文獻記載，泰王蒲美蓬及王室成員於1951年12月2日返回泰國。參閱：“A Chronicle of Fifty Years: 1946~96” in *Thailand: King Bhumibol Adulyadej - The Golden Jubilee, 1946~1996* (Bangkok: Asia Books Press, 1996), p. 67.

註⑭ *Ibid.*

註⑮ Kobkua Suwannathat-Pian, *Thailand's Durable Premier - Phibun through Three Decades, 1932~1957*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05.

註⑯ Willard A. Hanna, *Eight Nation Makers: Southeast Asia's Charismatic Statesmen* (N.Y.: St. Martin's Press, 1964), p. 285.



拉瑪九世登基並於一九五一年返回泰國後，泰王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才首度出國訪問越南；^⑥這是出自沙立一九五八年政變並執政後的建議，^⑦當然，這也隱含獲得沙立的允許。

拉瑪九世在位期間（1946年迄今），泰王已直接或間接見證了15次的軍事政變。很明顯地，泰王在與軍事政變領袖互動與處理政變方式上已有相當的經驗；素基（Sukit Chareonratanakul）認為就是因為這種經驗的累積，使泰王在歷次政變中都扮演所謂的調停者（mediator）或仲裁者（arbiter）的角色。^⑧然而，筆者卻有不同看法；筆者認為，拉瑪九世的政治策略與對政變的態度可以依據不同時期區分為三個類型：

（一）一九四七年政變至一九五一年政變：泰王政治策略在致力恢復一九三二年憲法的王權，泰王對政變的態度是消極的，泰王對政變的影響力源自歷史遺緒對政變者造成前述察立達通所謂的「心理制約」而已。

（二）一九五七年政變至一九七七年政變：泰王政治策略在賦予政變行動及其結果正當性，以換取執政軍事強人支持其發揮對實際政治的影響力，泰王對政變的態度是審慎的「選擇性的反應」，泰王對政變的影響力日漸重要，但仍未具有決定性的份量。

（三）一九八一年政變至一九九一年政變：泰王的政治影響力已達到具有「最終裁定」的優勢地位，泰王對政變的態度是以國家安定與人民福祉為考量的主觀認定，泰王對政變的認可與否成為政變成敗的決定性因素。

泰王對軍事政變的直接介入首見於一九五七以及一九五八年的政變。在沙立成功發動政變迫使批汶、乃拋分別流亡日本、瑞士後，泰王以王室文告正式任命沙立為曼谷特別軍事行政長官，要求政府官員及全體人民遵守沙立發布的一切命令。^⑨一九五八年沙立再度政變並出任總理，由於泰王再度給予支持，鞏固了沙立的專制統治，自此確立了泰王態度對政變的影響力。一九七〇年代，泰王介入軍事政變以及公眾事務的程度日深。舉例而言，泰王在一九七三年十月的「學生革命」事件就是非常公開、直接的介入，泰王發揮影響力促使軍方與學生對談，並在電視上宣布前法政大學校長桑亞（Sanya Thammasak）為總理，在廣播中宣布已要求引發流血事件的「禍首」他儂（Field Marshal Thanom Kittikachon）、納儂（Narong Kittikachon）與普拉巴斯（Field Marshal Prapas Charusathiar）出國，平息了流血事件。

於一九七五年出任總理的庫克里（M. R. Kukrit Pramoj）在他的回憶錄中對一九七三年事件中泰王的角色有如下的描述：「……此刻（一九七三年）泰王已經成為泰國一股無與倫比的力量，泰王說什麼人民就相信什麼，反之亦然。這必定會對泰國產

註⑥ 泰王出國訪問的時間集中在1959至1960年期間，“Royal Diplomacy,” in *Thailand: King Bhumibol Adulyadej - The Golden Jubilee, 1946~1996* (Bangkok: Asia Books Press, 1996), pp. 18~63.

註⑦ 陳鴻瑜，「泰國的軍人與政治變遷」，頁13。

註⑧ Sukit Chareonratanakul, *Watajak karnmuang Thai: Leuktung-Pataprahan [The Thai Circle: Election-Coups d'Etat]* (Bangkok: Odean Store, 1986), p. 5.

註⑨ Thak Chaloehtiarana, “The Sarit Regime, 1957~63: The Formative Years of Modern Thai Politics”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74), p. 513.



生深遠的影響。……然而，泰王似乎不甚關心政府的運作，他只關心人民的需求。我不知道這種巨大影響力對泰國最終是好或壞……。」^①

庫克里的預測與擔憂都實現了。在本文所謂的「第三階段政變」個案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泰王若站在政變領袖這一邊，則政變行動的成功是顯而易見的；反之，若泰王對政變持反對立場，則政變的結果堪虞。尤其是一九八〇年以後的政變，泰王的態度已是政變成敗的決定性因素；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五年的失敗政變與一九九一年的成功政變業已充分印證此一說法。然而，泰王在政變事件中究竟依據何種因素決定他的立場？為何泰王在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兩度政變中均反對政變行動而支持非民選的普瑞姆（Prem Tinsulanonda）政府，但在一九九一年卻認可政變行動而不支持民選的察猜（Chatichai Choonhaven）政府？

誠如庫克里所預料的，這是一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學者普遍的看法是：泰王對政變立場的選擇是以「正當性（合法性）」（legitimacy）的歸屬做為判斷的標準。然而，筆者對此持不同看法。就泰王對一九八一、一九八五與一九九一三次政變的態度而言，無法明確看出泰王對政變支持或反對與政變者是否具有合法性有關；泰王的聲明或行為所傳遞的訊息顯示，泰王就如同庫克里所言，他不關心體制的合法性，而是以做為一個愛民君主的立場，以求取和諧、順應輿情來對政變事件做最終的裁決。因此，這不是真正的合法性問題，充其量只是一種「看似合法性」（plausibility of legitimization）的問題。^②

二、群眾運動與政變結果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顯示，學生團體是對抗獨裁或軍事政權的最主要壓力團體之一。日籍學者鶴見（Tsurumi Kazuko）對學生運動（以下簡稱「學運」）有如下分析：「雖然絕大多數參與學運者都出身自小資產階級（petty-bourgeois），但他們的動機不是物質利益的，而是源自意識形態與理想主義。如果將學生視為一種社會階層（social stratum）來觀察，則將會發現其間存在社會背景與政治態度的重大分歧，無法清楚感受到學運具高度凝聚力的基礎。然而，他們科學化的知識、強烈的正義感與單純的愛國心，是當國家遭受外來侵略或國內政局動盪時，學生團體義無反顧進行抗爭行為的原動力。」^③

上述分析闡述了學生運動與社會、國家之間的關係，也適用於泰國的個案。然而，泰國學運的發展脈絡卻與國際趨勢大相逕庭。誠如普利齊亞（Ross Prizzia）的觀察：「一九七〇年始，大學生對學運的熱情逐漸降低，不僅西方國家（例如法國、美國）如此，亞洲國家（例如日本、印度）亦然；然而，一九七〇年代的泰國卻是學運成長、

註① Steve van Beek, ed., *Kukrit Pramoj: His Wit and Wisdom, Writings, Speeches and Interviews* (Bangkok: Duang Kamol Press, 1983), pp. 143~145.

註② Supaluck Suvarnajata, *op. cit.*, p. 43.

註③ Tsurumi Kazuko, *Social Change and the Individual*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08~309.



茁壯的年代。當西方與亞洲國家的學運團體數目與學運成效明顯下降之際，泰國學生組織卻大量出現並具有全國性問題的議價能力。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的政變發生時，學生是全泰唯一的反對勢力。」^④

泰國學運組織最重要的發展是一九七〇年二月三日成立「全泰學生中心」(National Student Center of Thailand, NSCT)，而首次大規模的抗議則是發生在一九七三年六月的「南甘杏大學(Ramkhamhaeng University)事件」。^⑤在隨後的一九七三年十月事件中，學生的示威活動獲得泰國輿論的支持，成為反對軍事政變與軍事獨裁的強大力量。全泰學生中心祕書長，也是一九七三年事件前遭政府逮捕的十三名反政府激進份子之一的舍拉育(Theerayuh Bunmee)對當時學運有如下解釋：「……任何勢力(包括軍方在內)一旦傷害學生，必然就傷害到人民。因為人民是學生的保母，人民愛護學生的同時，也期待學生能反應群眾的心聲、實現群眾的理想。學生以人民支持為後盾，增強了對政府的議價能力。」^⑥

泰國學生團體的政治參與在一九七〇年代逐步增強而在一九七三年達到高峰，並在其後的一九七六與一九七七年政變事件中扮演影響政變結果的關鍵性角色。這是一個早為研究者所發現的現象；然而，泰國學運為何在一九七〇年代政變中有如此影響力？又為何一九八〇年後此一現象會發生轉變？我們顯然無法自其論點中找出答案。筆者認為：一九七三年事件中，學運由和平示威轉變成暴力抗爭的主要關鍵在於學生團體獲得群眾的支持與認同，成為「社會力量的代言人」。隨著國際環境的變遷以及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軍事政權所暴露出的腐敗使人民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就外部因素而言，越戰的效應是美軍進駐泰國基地並對軍方大量援助，強化了軍方的政治勢力，引發反美示威；就國內因素而言，泰國政治中裙帶主義(nepotism)盛行造成貪腐成風，對照人民生活的艱困，更容易引爆民怨。誠如蓬披儂(Pornpirom Iamtham)所言：「在中產階級意識尚未具體形成前，泰國的學生團體站在社會不滿情緒的浪頭上，主導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zation)。在一九七三年事件中，農民、工人，乃至左派勢力的意見，經由學生團體的匯集與整合，透過學運的方式傳播；這成為爾後泰國群眾運動的一種主要趨勢，即使學生不

註④ Ross Prizzia and N. Sinsawasdi, *Thailand: Student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Bangkok: Allied Printers, 1974), p. 1.

註⑤ 泰國學生團體首度對軍事政變進行抗爭行為是在1952年，其後在1957年政變時，學生的示威被認為是導火線。1971年政變後他儂政府宣布戒嚴，引發學生抗爭，全泰學生中心發動大規模示威抗議九名南甘杏大學學生因批評他儂而遭退學處分，繼之展開1973年10月的「學生革命」。有關學運的發展過程，請參閱：Anond Pakdeewong, "Kuam samret lae kuam lomlaeo kong kaboun karn nak sukka thai: pijarana jag patjai dan onkarn, (The Achievement and Failure of the Thai Student Movement: Analyzing from the Factor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in Anathai Watanaporn, ed., *Karn muang Thai yook mai (Modern Thai Politics)* (Bangkok: Prae Pitaya, 1974), p. 97.

註⑥ Theerayuh Bunmee, "The Students Begin to Find Their Targets," *Student Society of Thailand*, July 1973, p. 1.



再站在第一線，不再以學運方式進行抗爭，但這種社會運動仍持續發揮影響力。」^⑦

自一九七三年「十月事件」至一九九二年「黑色五月」發生前，泰國官僚政體外部力量的展現，是由學生團體結合工會、組織農民、聯合左派團體，以群眾抗爭方式，對抗發動政變的軍人。在這二十年中，泰國中產階級雖不斷成長，^⑧並具有組織化的發展趨勢；^⑨但這股力量對軍事政變並未構成壓力，甚至對軍事政權傾向支持的態度。由於學生團體所領導的政治抗爭活動在一九七〇及八〇年代與泰國共產黨及其他左派勢力關係密切，因而造成中產階級對群眾運動的疑慮。一九七六年政變與學生領導的反政變示威中，因為對左派團體的立場分歧，使學生團體內部產生分裂，造成抗爭行動的失序，導致流血衝突事件。以一九九一年政變而言，中產階級明顯支持政變團體。^⑩

泰國中產階級對軍事政權的抗爭以一九九二年事件為轉捩點。關於一九九二年抗爭事件的階級屬性，泰國法政大學教授安匿（Anek Laothamatas）指出：「私營企業的專業經理人、中小企業商人是最近引人注意的一個群體，而大多數手拿行動電話，使新聞界稱遊行示威為『行動電話暴動』（mobile-phone mob）。而依據泰國社會科學協會的調查，參與示威的群眾中，52%教育程度為大學及以上；在職業別方面，80%為白領工作者、公務員與中小企業主；在收入方面，52%的月收入在10000泰銖以上。」^⑪據此，一九九二年事件的中產階級屬性應無疑義。泰國首度中產階級進行的大規模街

註⑦ Pornpirom Iamtham, "The Student-led Democratic Movement after 14 October 1973 Incident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 *Asian Review* (published by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Vol. 1 (Jan. 1987), p. 4-7-44.

註⑧ 泰國中產階級規模的擴張，可以自各行業產值佔GDP的百分比以及就業結構變化兩方面進行觀察：一、1960年，農業產值佔GDP的比例為42.2%，1990年則下降為13.6%。製造業產值則自1960年的12%，上升至1990年的27.7%。金融保險與不動產業則由1960年的1.9%，上升為1990年的5.6%。二、白領工作部門（專業、管理、文書、服務業）佔總人口的比例由1960年時的9.9%，攀升至1990年的22.9%。而白領階層數於私營部門的比重由1970年的23.6%，上升至1991年的52%。請參閱：Anusorn Limmenee,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Thailand: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its Rise and Political Ro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Southeast Asia, 1996, (Academia Sinica, Taipei, June 6~8, 1996), p. 6.; Kevin Hewison, "Emerging Social Forces in Thailand: New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ole," in R. Robinson and D. S. Goodman, eds., *The New Rich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44.

註⑨ 中產階級組織化的趨勢可以自泰國商業性社團組之的大量增加的現象得到印證。1967年全泰國的商會組織約為48個，到1987年時，以成長近5倍，達到233個。請參閱：Kevin Hewison, *op. cit.*, p. 142.

註⑩ 泰國軍人長期執政雖實行威權統治，但卻積極追求經濟成長；軍事政權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表現乏善可陳，但卻在經濟長方面有傑出表現。泰國在1965至1980年間平均GDP年成長率為7.2%；在1985至1994年間，平均GDP年成長率高達8.2%，居全球之首位。請參閱：宋鎮照，*東協國家之政經發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85年），頁87。

註⑪ Anek Laothamatas, "Sleeping Giant Awakens? The Middle Class in Thai Politics," *Asian Review*, Vol. 7 (July 1993), pp. 78~88.



頭抗爭，不僅成功迫使不具正當性的軍人總理蘇欽達（General Suchinda Kraprayoon）辭職，並帶動大規模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s）的政治參與。^②自此開展的泰國政變「第三間歇期」，使一九九一年政變很有可能成為本世紀的泰國最後一場政變。關於泰國中產階級對軍事政變與軍事政權態度的遽變，必須由軍事政變所造成的效應進行探討。

陸、結 語

一、泰國軍事政變的影響

泰國政治過程中軍事政變的循環效應，使政變的影響不僅是政治層面的，更對經濟與社會造成巨大衝擊。軍事政變的影響並非單向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各層面因政變的發生（不論成功或失敗）所產生的效應（包括正面與負面），將對政變本身產生反饋的效果，使政變在政治過程中的地位產生變化。

就經濟層面效應而言，泰國長期軍人統治並未造成經濟衰敗，反而以威權統治創造快速經濟成長；泰國經濟的優異表現被視為是歐當納（Guillermo O'Donnell）所提出「官僚威權國家」（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State）發展模式的最佳範例之一。^③這也是一九九二年以前泰國中產階級對軍事政變與軍事政權抱持冷漠與寬容態度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一九九〇年代泰國經濟國際化程度日深，對外經濟關係的重要性日增。因此，軍事政變與外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增減的關聯性是探討的重點；尤其在「第三階段政變」的個案中，FDI 的變化是觀察政經情勢互動的重要指標。素提沙（Suttisak Sinthunava）曾研究一九七〇至一九九一年間泰國軍事政變對 FDI 流入的影響，該研究的若干發現值得探討：^④第一、軍事政變對 FDI 流入的影響是正面效應與負面衝擊兼具。第二、一九九一年政變與 FDI 流入呈現明顯的負相關。第三、一九八一年政變與 FDI 流入呈現相對的正相關

上述論點有助於探究為何長期沉默的泰國中產階級在一九九二年事件中，以阿崙頌（Anusorn Limmenee）所謂的「新中產階級」（New Middle Class）力量積極投入政治抗議行動。^⑤在一九九二年以前，軍事政變後的軍事政權結合企業界，因創造國內經濟的高成長而形成中產階級的支持，這是阿崙頌所謂的「舊中產階級」。

註② 關於 NGO 在泰國政治改革與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與參與，請參閱：Thai NGO Support Project (TNSP), *Thai NGOs: The Continuing Struggle for Democracy* (Bangkok: TNSP Press, 1995).

註③ Guillermo O'Donnell,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State," *Latin American Review*, Vol. 13, No. 1 (Spring 1978), pp. 3~38.

註④ Suttisak Sinthunava, "The Impact of Military Coups on the In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ailand"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La Verne, 1994).

註⑤ Anusorn Limmenee, *op. cit.*, p. 1.



一九九一年政變對泰國經濟的重大衝擊，給中產階級一個教訓：在一九九〇年代的國際政經秩序中，軍事獨裁不再是資本主義的最佳庇護所，反而成爲他們經濟利益的障礙；軍事政變不再是終結政府貪污的非常手段，而是令外資裹足不前的票房毒藥。

當官僚政體外部力量自一九七三年事件開使成爲對抗軍事政權的反對勢力以來，泰國軍事政變進入高度變動性的「第三階段」。一九八〇年代兩次的失敗政變具有其重要意義：普瑞姆總理長達八年的統治，代表了軍事政變的正當性逐漸消退，雖然一九九一年政變以政府貪污爲藉口推翻民選總理察猜，但政變所產生的負面效應終究激起中產階級對軍事政權的強力抗爭。^⑥一九九一年政變無疑是一次成功的政變，但政變造成對經濟的負面效應，連帶引發中產階級大規模抗爭的社會效應，致使政變領袖無法再仿效前例，取代過渡總理而直接掌握政權。

在傳統上泰國是一個典型的封建社會，泰國歷史經驗中亦缺乏與歐洲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類似的、追求自主與自治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泰國國家發展是在軍人與軍事政府主導下進行，中產階級不僅數量有限，更因在實質利益上與軍事威權政體有共生關係，使得中產階級意識並未見強化。然而，自一九九二年事件之後，客觀環境愈來愈不利軍事政變的再次發生。文人政府的逐步穩固、中產階級的壯大與NGO組織的擴散，形成對政變行動的一種反饋，使泰國軍人逐漸接納文人控制機制，對政治的脫離（disengagement from politics）也已逐步展開。

泰國軍人以軍事政變方式達成對政治的「支配」，而以操縱惡性循環的政治過程維持對政治的「影響」；其正當性（合法性）來自於與泰王的認可（政治權力的交換），穩定性則來自經濟高度成長獲得的社會支持（利益共生的關係）。現階段泰國政變的合法性危機是雙重的：泰王的態度已成爲政變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而泰王係以人民的意向與福祉爲依歸；因此，合法性的問題反而成爲以社會支持與否爲關鍵。至於社會力量對政變的態度由過去的「學生團體反對、中產階級默許」轉變爲「中產階級反對、社會支持喪失」，顯露出政變已經逐步被「去合法化」（de-legitimized）。

雖然軍人對此趨勢仍持續採取抗拒態度，也試圖製造國內動亂以伺機干政；但對於未來泰國政變可能性的預測，筆者認爲，關鍵在一九九一年起的政變「第三間歇期」的持續性。「第三間歇期」持續愈長，則對政變不利的情勢愈難逆轉。

二、泰國軍事政變的特徵

本文從泰國政變的成因、結果與影響三個層面進行觀察，充分瞭解泰國政變所具有高度複雜性以及預測的困難性；在本文有限篇幅的討論後，可以發現泰國軍事政變

註⑥ 有關泰國中產階級的興起及對1992年事件的參與，請參閱：龔宜君、張景旭著，「發展中的東南亞中產階級：對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與菲律賓中產階級形成之評析」，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民國86年），頁12~19。



具有下列幾個特徵：

首先，在「正當性」方面，泰王對政變的認可（亦即政變合法性的認定）將日趨謹慎與收斂。泰王做為政變「護身符」（*talisman*）的角色並非出自泰王自願，而是泰王與政變領袖間的一種妥協，當泰王的政治地位鞏固並不斷提升之後，泰王對政變的認可就產生選擇性，但這種選擇性並非以合法性為依據。在軍事政權遭逢挑戰之際，泰王以國家象徵之超然地位介入政變，其行為已引發爭議。泰國最高法院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對「蘇欽達控告蕭素樂（*Sulak Sivaraksa*）毀謗及對泰王大不敬」案^⑦的劃時代判決指出：「……判決被告罪名不成立的理由不是意謂著詆譏泰王無罪，而是泰王政治事務的行為是可供公評之事，批評泰王對政變的立場並非污衊泰王做為國家的象徵，不構成原告所指控之罪名……。」^⑧當政變者不再輕易擁有護身符後，對軍事政變由「去合法性」進一步予以「非法化」的行動才有可能，也才能在一九九七年憲法中明訂政變為違憲。政變正當性的取得愈困難，政變的再發生率就愈小。

其次，就「政治過程」而言，當一九九二年事件終止蘇欽達再度運作「惡性循環」政治模式後，政變在當代泰國政治過程中已失去有利的戰鬥位置。若再有新的政變發生，這將是體制外力量對政治體制的衝撞，將與過去六十年間的19次軍事政變性質迥異，其成敗與影響程度更將難以逆料。

再者，就「政變效應」而言，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泰國對外來投資的需求將日趨殷切，而出口導向的經濟更需要海外市場。因此，當代軍事政變除了直接造成FDI的大幅萎縮外，軍政府更將難以為大多數國家所接受，這勢將影響出口市場的開發。因此，軍事政變不僅在國內失去有利位置，更成為拓展對外經貿關係的障礙。在泰國國內，中產階級的「市場位置」（*market position*）大幅提升，取得有利的議價地位；在國際社會，文人政府更容易獲得他國的認同。這種趨勢對於泰國軍事政變而言，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境。

泰國軍人的政治角色由國家安全轉變為國家發展，持續發揮對泰國政治的支配與影響。雖然目前泰國軍方的政治權力受到大規模的壓抑，但新的「軍人—文人關係」互動型式仍在調適階段，仍潛藏爆發衝突的因子。但可以肯定的是，泰國軍人仍將具有政治角色與權力，但必須透過文人的政治遊戲規則運作，軍事政變的風險與代價都已大幅提高。一九九一年政變蘇欽達以終結民選政府貪腐為理由發動政變成功，並獲泰王及人民的支持；然而，當蘇欽達依然師法故技，違背舉行大選的承諾而逕行出任

註^⑦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the Black Case No. 190/36 issued in Bangkok on 26 April 1995. Criminal Litigation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English copy).

註^⑧ 關於本案緣由，請參閱：*Sulak Sivaraksa, Loyalty Demands Discent: Autobiography of an Engaged Buddhist* (Bangkok: Thai Inter-Religious Commission For Development, 1998), pp. 192~206.



總理後，過去軍事政權的貪腐形象已激怒人民，大規模社會力量動員迫使使蘇欽達成爲泰國政治中最短命的總理。文末這一段話或許可以代表現階段泰國人民對軍事政變的感受。

Expecting the military to terminate corruption is like expecting the Mafia to terminate organized crime.
— Ji Ungpakorn[◎]

* * *

(收件：88年5月23日，修正：89年2月23日，接受：89年2月24日)

註[◎] Ji Ungpakorn 現爲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教授，其父 Puey Ungpakorn 曾任泰國法政大學校長，是泰國社會運動的先驅。該文引自：Ji Ungpakorn,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ailand* (Bangkok: Arom Pongpangan Foundation, 1997), p. 73.



The Causes, Outcomes, and Effects of Military Coups: The Case of Thailand

Pei-hsiu Chen

Abstract

Military coup d'état has always been treated as an important topic in both the area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However, most studi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coups instead of exploring their outcome and effects. Regardless of success or failure, coups do impact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socio-economic effects caused by a coup can affect possible future military takeover attempts.

Thailand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above argument. Since the first constitution was promulgated in 1932, there have been 19 general elections accompanied by 19 military coups. Despite this “vicious circle,” the Thais have created a “semi-democracy” in the third wave of global democratization.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of coup studies. It then attempts to build up a causal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Thai coups. It demonstrates the “intermittence” and “phases” of Thai coups by way of calculating their “frequencies,” and tries to explain the causes, as well as the outcome and effects, of Thai coups through two dimensions : mass movements and the role of the King.

Keywords : military coup; Thailand; King; semi-democracy

